

宽仁谢永旺

□高洪波



谢永旺

谢永旺先生以89岁高龄离开了我们。9月3日一早，我们一行亲朋好友和他告别。告别的时候，有一个简短的仪式，我说了几句发自内心的话：宽仁谢永旺。永旺先生，宽容、宽厚，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这些曾经的部下充满仁爱、仁慈之心，用自己厚重的道德修养养与人相处。所以“宽仁”二字，是我对他发自内心的评价和认可。

永旺先生，笔名沐阳。当年文坛有“黑八论”，被批了整整10年，其中有一论叫“中间人物论”，“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沐阳永旺。永旺是我的老领导。1978年8月，我从云南军旅复员转业，由炮兵排长直接转变为《文艺报》的记者兼编辑。还有两个人和我同一个月进入刚复刊的《文艺报》，一个是唐达成，另一个是雷达。《文艺报》当时的办公地点非常令人羡慕，在礼士胡同129号，它曾经是清代名人刘罗锅子刘墉的府邸，后来成为印尼大使馆，再后来归文化部所有。这是一个接近王府般的四合院，里边有游泳池，当然没有水，有小放映厅，亭台楼阁，环境优美。我从遥远的云南边疆一个叫大荒田的地方突然进入这样一个近似于《红楼梦》里描写的场景，内心的惊喜、惊异乃至惊讶就可想而知了。

《文艺报》当时年轻人不多，除了我之外，还有李炳银、寒小风、李燕平、陈新民，以及稍晚一些的臧小平、李维永和更晚些的郭小林。我们这批从祖国边疆各地以转业军人或者老知青、兵团战士的身份，一股脑进入刚刚复刊的《文艺报》，成为一群急迫地需要学习、需要追赶时代的年轻的文艺战士。用“战士”这个词好像略有夸张，但当时确实如此。当我们进入《文艺报》的第一天，永旺先生以编辑部主任的身份和我们见面，如果说当时的主编冯牧和孔罗荪是《文艺报》这艘大船的船长，我觉得那时候的谢永旺先生堪称大副。他和我们这些年轻人谈话，第一件事让我们把从创刊以来的《文艺报》逐一认真阅读，这是一个指导职场新人入职的特殊方式。然后他告诉我们，办报的人必须以俄国别林斯基为楷模，因为别林临终时是枕着他所创办的《祖国纪事》入葬的。短短几句话让我们心中顿生神圣感和庄严感，觉得我们这些新人肩上的任务是何等的沉重，未来前途是何等的光明，而道路又是何等的遥远啊！

永旺先生特别擅长体育，他的乒乓球打得非常好，游泳技术尤佳。我记得当时永旺、雷达和我是《文艺报》乒乓球的三个主要选手，迎战过不少对手。而说到游泳，曾经有一年《文艺报》的同仁们赴北戴河消暑，住的环境非常简陋，是在刘庄的一座工厂里，冲澡都是自来水，但是我感觉到了莫大的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有了谢永旺。他领着我们游泳的时候游过拦鲨网，拦鲨网的外面意味着危险。我们几个人跟着前一马当先的谢永旺奋力地向远方的一艘捕蟹船游去，我壮着胆努力地划着，旁边还有同样年轻的寒小风。水深浪阔，然而永旺毫无惧色，从容不迫地领着我们向那艘远方的捕蟹船径直游去。船上没有一个人，我们登上之后，回头一望，人影已经很小了，海滩显得模糊，但是那种感觉、那种状态、那种突破自我胆怯之后所获得的身心解放的愉快，是平生很难感受到的，谢永旺用他的实际行动让我和寒小风享受了那难忘的一刻。从此之后，每到北戴河，我都要越过拦鲨网向深海游去，当然我的前面已经没有谢永旺的身影，可是我知道他一直在那默默地鼓舞着我们。

在谢永旺当编辑部主任时期，他的两个副主任分别是分管理论的陈丹晨先生和分管评论的、我的组长刘锡诚先生，他们三位合作得特别好。永旺先生是兰州大学毕业，当时作协的主力编辑们多来自两个学校，一个是兰州大学，一个是北京大学。在我的记忆中，兰州大学的除了谢永旺，还有周明、阎纲和后来的雷达，而北大的则有陈丹晨、吴崇昌、崔道怡等等，刘锡诚也是北大的，但他不是中文系，是俄语专业。当年在文艺界，这两个名校的学生很多在年轻的时候都是优秀的青年才俊，到中年是业务骨干，到老年大多成为名编或者是著名的评论家，或者是文艺界独当一面的领导人。

我记得在《文艺报》时，为了培养我，推荐我上文讲所六期学习。文讲所五期（是继“文革”后刚刚开始的首期）的学员有蒋子龙、王安忆、贾大山等，六期是以少数民族作家为主。我刚去报到没有多久，上学仅仅一个星期，永旺先生告诉我：“洪波，回来工作吧，七期你可以再去，那是评论编辑班，更适合你的专业。”于是我于六期退学，一年之后成为鲁院七期即评论编辑班的学员。后来我们七期和八期又集体组合成为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而永旺先生自始至终支持我忙碌中踉踉跄跄地学习。这一变动使我终生受益，所以我非常感谢关键时刻永旺以一个过来人和老大哥的身份对我的提醒和规划，这真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对部下最真挚的关心。永旺曾经给我开过一张书单，里面说评论生涯一定要读书破万卷，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永旺先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了党员，一直特别受到作协领导人张光年的重视。在同龄人中他应该是进步很快的，所以他经常笑着跟我们说：“‘文革’中，我不是‘黑帮’，不是走资派，但有一个名字‘小爬虫’。”说完，他管自笑着，我们也跟着笑。因为“黑八论”中“中间人物论”出自他的笔下，“小爬虫”应该还是比较客气的一种政治待遇吧。

永旺和我们相处大概4年左右，他调离了《文艺报》，出去创办了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创作研究部，当时叫创作研究室。《文艺报》的人他挑走了几位我的同事，包括李炳银、郑兴万、郭小林，这都是我们非常亲密的伙伴。永旺组建创作研究室的第一件事就是茅盾文学奖第一届评奖进行筹备和开奖工作，工作单位是全新的，茅盾文学奖也是首创的，由此可见永旺先生工作的开拓性是如何的优秀。

当时虽然《文艺报》一分为二，兵分两路，但是大家好像没有任何疏离的感觉。因为上班在一个楼里，就是老文化部大楼的五楼，吃饭在一个食堂，体育活动也常常在乒乓球桌上相见，所以永旺的离开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是很小的一件事，很短暂的一个过程。而且很快，一两年之后，《文艺报》改版，由月刊、半月刊变成周报，谢永旺经历了作协四代会之后，成为《文艺报》年轻的主编，大副变成了船长，我依然还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那个时候我的身份是记者部副主任，和另一个副主任晓蓉共

同领导着六名记者，这其中有余璞，后来成为画家和诗人；有沙林，后来成为一家出版社的主编；有应红，后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还有聂建国、包利民、刘福和。八个人的记者部在当时兵强马壮，但我们没有一个学的新闻专业，谢永旺请来新华社赫赫有名的女记者郭玲春，为我们讲授新闻业务。那一刻记忆鲜明，因为郭玲春说道：“中国和外国记者不一样，外国的记者讲究采访对象把你从门口赶出去，他从窗口爬进来，而中国的记者我可能从此再也不会理睬你，这是一种职业的尊严。”郭玲春讲课的时候，那精彩的一幕谢永旺也在现场目睹，这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也是唯一一次关于新闻专业的特殊讲座吧。

应该说我在《文艺报》10年的工作经历中和永旺先生几乎是朝夕相处、密不可分，他对部下的关心和帮助，我历历在目。在记者部任职期间，我曾提出进行大西北数省的采访，沿途对各省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文化咨询和报道。永旺先生特别支持我的选题创意，他知道我要到兰州，专门把他的老同学、当时甘肃文联党组书记克坚推荐给我，让我寻求他老同学的帮助。这就是宽和仁慈、热诚待人的永旺先生，他的人品，他的文品。

他当年如何认真地写作张贤亮新作品的研究，让我难以忘怀。他作为资深编辑，曾经发现并组编了《闪闪的红星》《大刀记》《黄海红哨》《沂蒙山高》等一批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撰写了《独树一帜——论高晓声的小说》《在严峻的生活面前——论张贤亮的小说》。关于张贤亮这篇评论，永旺写得认真慎重，我记得他不断到评论组找刘锡诚、阎纲进行商量。正是这篇评论，宁夏的张贤亮才得以脱颖而出，改变他的生存状态，这个恩情张贤亮一直记着、感激着。但是永旺先生轻易不写文章，我曾经拿周围《文艺报》的同事们，一个个批评家、评论家，向他咨询，那个时候无论刘锡诚还是雷达，包括阎纲、孙武臣、李炳银，甚至稚嫩的我都已经不断地在书写着自己专业的相关文章，而雷达、阎纲、孙武臣、李炳银在他们工作的领域俨然是专家了。永旺听到我的询问，笑着说：“我当编辑久了，有一个词叫‘眼高手低’，对自己的文章越来越不满意，加上行政工作这么多，所以就越写越少了。”说这话时，他摇着头苦笑着，内心似有无限感慨，我还看到这一特殊岗位留给他的一种沉重压力下的无奈。是啊，永旺先生的人生选择是从一个评论家的理想开始，到成为一个优秀的组织工作者、编辑家而结束。

后来他离开了《文艺报》的岗位，但是我依然和他有无数次的接触，这就是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编委会。这应该是1994年的事情了，如今“21世纪文学之星”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一个重要的培养青年作家的品牌。而在初创时期，永旺先生功不可没。除了带领我们的冯牧、袁鹰两位老先生之外，还有谢永旺、张凤珠、崔道怡、张守仁以及年轻的雷达、白描和我一干人等，这其中谢永旺先生发挥了极大的组织能力和编辑才智。

现在“21世纪文学之星”培养出的茅奖、鲁奖、儿奖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家们已经有几十名之多，堪称灿烂的“星座”。当年在这些老编辑草创这个文学品牌初期，我曾经跟组织者张锲先生说过一句开玩笑的话：“这是用军官团打冲锋。”因为这些编委们都是各大报刊著名的编辑家或者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导，由他们来逐一鉴定一部没有出版的年轻人的文稿，甚至将初审、二审、三审集于一身，还要完成作序的任务。这个工作本身功德无量，是对中国文学事业后继力量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能源补充和战略设计，而永旺先生正是这其中一重要的参与者。

在永旺先生生命的晚期，我曾无数次看望过他，为他的孙子送过我写的儿童文学作品，他非常开心。而他的独子，当年那个和我们一起游过密云水库的少年谢欣，现在也继承了永旺先生的编辑事业，成为《当代》的编审。谢欣告诉我，他明年也要退休了。听到这话，我猛然感到时间和岁月是如此迅速地流逝着。岁月尽管流逝，但是那记忆中鲜明的影像就像时间河流中一块一块凸起的坚硬的礁石，岁月的河流冲不走。所以我用这篇小文悼念远去的永旺先生，一个生命和事业之舟中曾经的大副、后来的船长、具有开拓性能力的组织者，一个宽仁的长辈，我感谢他在我成长中所做出的巨大帮助，我感激他，感念他，同时更感怀他！

永旺先生，走好！

老谢，我还没有准备好……

□贺绍俊



左起：谢永旺、李基凯、陈丹晨

接到鸿鹰的电话，说谢永旺走了，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及至明白“走了”的意思时，头脑竟是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发生呢？我还没有当面再叫一声“老谢”啊！

谢永旺是1985年调来文艺报社当主编的，他来了之后，我们都叫他“老谢”，几十年来我就一直叫他“老谢”，他也一直叫我“小贺”，一声“老谢”，一声“小贺”，叫起来觉得很亲切。

在老谢来文艺报社之前，文艺报社的名称是《文艺报》编辑部，是一本月刊。当时的主编是冯牧和孔罗荪，副主编是唐因和唐达成。我和几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便分配到《文艺报》编辑部，不用多久，我们都喜欢上了这里活跃、民主的编辑环境。当时主要是唐因在主持日常的编辑工作，他毫无架子，又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的个性，我们特别喜欢听他无拘无束又充满机智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也就把工作布置妥当了。我们都为有这样的主编而庆幸，没想到才过了一年多，中国作协希望《文艺报》能适应中国社会的改革大潮，决定将《文艺报》由刊物改为报纸，我们便投入到了改版的紧张准备工作之中。因为改版，《文艺报》编辑部也改为了文艺报社，连领导班子也作了彻底的调整，老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中国作协派到文艺报社担任主编。有一天早晨，我上班推开了总编室大门，发现老谢站在屋中央和陈老陈说话，我一愣，口齿不清地叫了一声“老谢”，老谢带着笑意朝我点了点头。我尴尬地退出房间，走出房门后摸了摸后脑勺，看来自己的心绪还在留恋过去美好的编辑时光，对于老谢的到来，我还没有准备好呀！后来我逐渐发现，老谢比我们更看重活跃、民主的编辑环境，他像唐因一样没有领导的架子，而且他比唐因更随和，更平易近人。比如他就是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上班的，我也从来没有去想他作为主编是可以让报社的小车接送上班的。他在编前会或评刊会上似乎也更倾向于听大家的发言，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鼓励别人把想法说得更充分一些。

自从改版为周报后，编辑工作的节奏加快了，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常常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总编室，所有版面的排版、调整等问题都汇聚到这里，他们叫苦连天。有一天，老谢叫住我，说小贺，把你调到总编室吧。虽然我知道总编室缺人手，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去做总编室的工作，便脱口而出：“老谢，我可没有作好准备去总编室呀！”老谢笑了笑，说你知道你没有这个准备，不过现在准备也来得及。然后他对我详细说了为什么会考虑要让我到总编室工作，他分析了我的优点，总编室的工作特点，说得是那么坦诚，我也就默默地点了点头。第二天，我就将办公桌移到了总编室里，我正在桌前收拾东西时，老谢进来了，笑着对我说：“现在都准备好了吧！”我不好意思地笑了。

准备好了——这仿佛是老谢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式。他从来不会做出鲁莽、轻率的举动，在他的言行中就能看出深思熟虑的痕迹。但他从来不会因此就圆滑处世，推卸责任。相反，他是一个勇于担当责任的领导者，当然，一旦他要担当起责任，他一定是作好了充分准备的。这就是他本人的性格特点来说“准备好了”的。从处事方式来说，老谢则是以“准备好了”的姿态去为别人提供一个思考的空间。老谢并不爱给人下指令，哪怕这是他作为主编应有的权力，他善于用商量的方式布置工作。他用一个信任的眼神看着你，就像是在对你说“准备好了吗？”总编室的工作往往要与老谢直接打交道，因此我常常要接收到老谢这种“准备好了吗？”的眼神，这给了我一种轻松感，也更激发起我的自主性。这恰好证明老谢具有一种建立在现代民主意识基础之上的领导艺术，他这样做，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更加圆满，因为在商量和期待中其实也是老

谢在给人提供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又何止是领导艺术。长期与老谢接触，便越来越感觉到他内心的温柔。我想，这也一定是为什么人道主义精神在他的文学观里占有很大分量的重要原因吧，或者是因为他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才使得他有了一颗温柔的内心；关心和体贴别人，这对他来说就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文艺报社的同仁们几乎都没把他当成领导毕恭毕敬。记得有一年文艺报社举行新春联欢会，老谢成为了联欢会上的舞蹈明星，大家都争着要与他跳一圈。让我最难忘的是有一年除夕在老谢家吃年夜饭。我刚接手总编室的工作，等春节过后再探亲。老谢听了我的计划后，沉吟了片刻，他似乎觉得不能让我在春节期间回家乡与亲人团聚于情不忍似的，但工作又必须由有人来做，最终他才从口中吐出“好吧”这两个字，接着他马上说道，大年三十你就来我家吃年夜饭！我正要开口推辞，他一把拦住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就这样定了！

当我再一次默默地叫一声“老谢”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仍是他那倍感亲切的笑容，忍不住要诉说的仍是他那令人敬佩的品格。他低调、正直、宽容、豁达，在这样一个道德标杆一再拉低的浮躁年代里，老谢显得是那么的珍贵！我以曾与老谢有过一段共事的岁月而感到荣幸，也以老谢的品格为楷模暗暗鞭策自己。但仅仅这样说还不足以概括出老谢的全部！因为他是一位具有犀利眼光和职业操守的编辑家，也是一位具有扎实理论功底和敏锐艺术感觉的文学评论家。我知道，《闪闪的红星》和《大刀记》的出版就凝聚着他的心血，在那个文化思想处在偏执状态的时期，这两部小说能够保持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公开出版，是与老谢在编辑上的努力和智慧分不开的。1972年，《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写出初稿后，邀请老谢去山东看稿，老谢看稿后，特别肯定了作者在语言上融入古典文化和民间文化的韵味，以及对人情之美的表现。虽然该书的出版几经周折，但仍尽量保持了作者在这方面的追求。老谢作为一位文学评论家，他看重每一个作品的分量，张光年曾以“正直、勤奋、好学深思”来评价他的文学评论写作。他不作惊人语和偏激之辞，也不说套话空话漂亮话；他坚持从文本出发，从理解作家内心出发，因此他的评论文章总是服人心的。凌力就格外佩服于老谢对她作品的评论，她甚至认为只有老谢才真正认真读了她的全部小说。我想这应该是一位作家对评论家最高的赞赏了。

老谢不担任《文艺报》的主编后，我与老谢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有机会见面，我总愿意和老谢多聊聊，其实我是想请他多给我一些指点。我也曾有念头要认真对老谢作一次访谈，因为他一生为中国当代文学事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他一定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思想积累，这一切连同他的著作，是一笔非常有价值的精神财富。可是我总还是以还没有准备好为理由一再拖延着，如今这个念头竟成为了我对老谢永恒的愧疚。

老谢！要像你一样为人正直，为文真诚，我们都准备好了……

工匠叙事

□韩振远



一部厚重的史书更清晰直观，可知隋代的桥梁技术、审美观念、交通状况及气候特点。

地处山西芮城县的永乐宫内，有中国现存唯一的元代宫廷建筑群，其中三清殿内的大型壁画《朝元图》，代表了中国古代壁画的最高水准，四百多平方米的画面，祥云缭绕，瑞气浮动，290位神祇层层叠叠，盛大的场面，众多的人物，流畅的线条，绚丽的色彩，既气势恢宏又纤毫毕现，至今仍是为叹为观止的艺术巅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描绘这幅宏伟画作的连画家也称不上，该怎样称呼他们呢？匠人，对，描绘壁画的匠人。壁画诞生后，甚至没人知道画匠是谁，数百年后，考古工作者才在三清殿神龛东北角上方的一组题记中发现了他们的名字。“河南府洛京山角吉祥、长男马七待诏，把作正殿前七间、东山四间、殿内斗心东面一半、正尊云气五间。泰定二年六月工笔（毕），门人王秀先、王二待诏、赵待诏、马十一待诏、马十二待诏、马十三待

诏、范待诏、魏待诏、方待诏、赵待诏。”原来是一位画匠带着他的儿子和十位徒弟所为。

这让我不由想起寻常常见的匠人班子。之后，游览各地古建筑和古器物，我会留意有没有工匠的名字，多数情况下，都令人失望。中国古代只有工匠，没有建筑师，古人只注重建筑、器物本身是否有价值，没人在意由谁制作。

从这些古建筑、古器物中，我看到了历史。人类文明的延续，固然有帝王将相的改朝换代，有武将们的沙场驰骋，有文人的书翰弄墨，但更立体、直观，其实是工匠的制作。帝王将相的故事只是如烟往事，只有工匠们的默默劳作，留下了实物，可以观瞻，可以触摸，可以感知，还可以联想。

人类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最具说服力的实物竟然是由不起眼的工匠留下的。参观国家博物馆，庞大的展厅满满当当，陈列有序，看似展示不同的时代风貌、不同的文化

天气晴朗，蓝得澄澈，高耸的古塔在纯净的天空勾勒出刚劲的线条，天与地就连在一起。这是座宋塔，与东边不远处的另一座古塔兄弟般并峙，被称为妙道寺双塔。我每天都多次从两座塔前走过，望双塔耸立，白云舒卷，古代建筑特有的文化气息好像在眼前氤氲开来。

我和小城居民天天看这两座塔，将这两座塔视为地标，引为骄傲，赞之为唐风宋韵，却从没有人想过这两座塔是谁建造的。其实，建塔人的名字就明明白白写在塔宫碑记上，只是没人关注罢了。谈过此塔方位、形制“广方四角，高耸双层”之后，塔宫碑记文末记载：“修塔匠人乔真”。

如此精致雄伟巧夺天工的古塔，竟出自一位普通民间工匠之手。这位叫乔真的匠人，用自己的方式，为后人留下遥远的宋代信息，从建筑风格到民间信仰，他的叙事方式是直观立体的，穿越历史，跨越时空，但是，没有人在乎建造古塔的是谁。因为他只是个匠人，做的是与泥水砖瓦打交道的粗活。

妙道寺双塔所在地，是唐代开元名相张嘉贞的家乡，古称三相坊。开元十四年（726年），张嘉贞娶后，代卢从愿为工部尚书、元州刺史、北平军事”，路过赵州，留下了一篇影响巨大的短文《石桥记》，记叙赵州桥的雄姿，开篇一句即为：“赵郡没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迹也。”一句话，让后人得知这座伟大的桥梁是工匠李春的杰作。看这座桥，比读

风情，不如说是在展示工匠技艺。新石器时代太遥远模糊，但工匠们留下了陶器，黑陶、彩陶、纹理、彩绘，不管用多么简单的工具，不管由一双什么样的手做成的，传递的都是上古信息。最感动的是青铜器，四羊方尊、蔡侯申方壶、七牛虎耳铜觚、乳丁纹青铜方鼎，一件件看罢，赞叹器物的巧夺天工之后，进而联想，整个青铜时代，一千多年的历史，其实是由制作这些器物的工匠们表达的，连那些甲骨、竹筒上的文字也不例外。与后世史官们浩繁的文字相比，他们的叙事华丽而又简洁，真实到可以触摸，立体到可以多方位观瞻。还有引起轰动的三星堆宝墩，那些陶器、石器、玉器、铜器、金器，震撼了人们心灵。人类脱离蒙昧至今，经历了数千年历史，工匠们是历史叙事的全程参与者，即使文字诞生后，工匠们仍然是历史叙事的主角，史家、作家和艺术家不过伴奏者。

帝王将相由史官留下了名字，文人墨客用作品留下了名字，所谓千古风流人物，大多是这么表述的。工匠们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做完了自己的事，得到该得的酬劳，继续养家糊口，过平凡的生活，至于留下的以后归谁，与自己无关。但他们的作品是实实在在地，集实用、艺术、文化、历史于一体，不光当时供人使用、观赏、把玩，还会留下深深的印记，像浮动于空中的音乐，如同描绘在大地上的画作，如梦似幻，又那么生动真实。